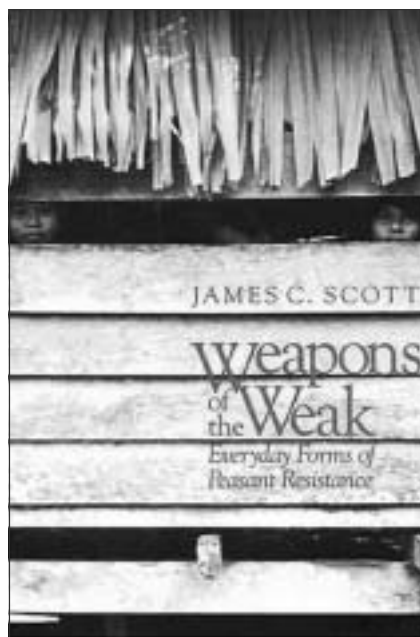


## 「弱者的武器」及其意義

### ● 郇建立

農民的行動通常是隱蔽的、無組織的，他們很少進行革命和叛亂，因為這類活動過於危險，很容易遭到政府的鎮壓。在這種背景下，斯科特把注意力轉向了農民的日常反抗，包括嘲笑、諷刺、磨洋工、開小差、裝傻賣呆、小偷小摸、暗中破壞、流言蜚語等等。這些都是「弱者的武器」。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985年，美國著名學者斯科特 (James C. Scott) 根據他在一個馬來西亞村莊的田野調查寫成《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下引此書只註頁碼) 一書，該書的副標題是「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中譯本已由譯林出版

社於2007年1月出版。斯科特在〈序言〉中明確提出，以往的農民研究 (包括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1966; Jeffrey M. Paige, *Agrarian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Export Agricultu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1975; Eric R. Wolf,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69; Samuel L.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1979; 以及斯科特本人的著作James C.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1976)，都有一個缺陷。它們比較關注農民的反叛與革命，換言之，比較關注公開的、有組織的政治行動。然而，農民的行動通常是隱蔽的、無組織的，他們很少進行革命和叛亂，因為這類活動是過於危險的，很容易遭到政府的鎮壓。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斯科特把注意力轉向了農民的日常反抗，包括嘲笑、諷刺、磨洋工、開小差、裝傻賣呆、小偷小摸、暗中破壞、流言蜚語等等。顯然，這些都是「弱者的武器」。

在《弱者的武器》一書中，斯科特不僅詳盡地考察了農民的日常反抗，還反思了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的霸權理論。如果說該書前一部分屬於人類學的民族志，後半部分則是他的理論貢獻。斯科特不是「專業的」人類學家，但他的寫作採取了「經典的」人類學的敘述方式：以講故事的方式提出問題，隨後進入田野，用翔實的田野資料進一步論證有關命題，並在論著的結尾與相關理論進行對話。在《弱者的武器》一書中，斯科特首先以窮人拉扎克 (Razak) 和富人阿尤布 (Haji Ayub) 的故事提出了農民的日常反抗問題，接着對田野地點塞達卡村 (Sedaka) 進行了全方位的描述，隨後詳盡研究了村民的經濟反抗和意識形態反抗，並在結尾部分用村莊的田野資料與葛蘭西的霸權理論進行了對話。

## 一 農民的日常反抗

《弱者的武器》的副標題表明，該書的研究主題是「農民的日常反抗」。斯科特指出，這類反抗有一些共同特點：(1) 它們幾乎不需要事先的協調或計劃；(2) 它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絡；(3) 它們通常表現為個體自助的形式；(4) 它們避免同權威發生任何直接的、象徵性的對抗。與此同時，這種低調的反抗技術非常適合農民的社會結構——農民階級分散在廣闊的鄉村內，缺乏正式的組織，擅長游擊式的消耗戰。在此，斯科特堅持認為，從長遠來看，恰恰是這類反抗最有意義、最有成

效，因為它們避免了公開的集體反抗所帶來的風險。

斯科特明確指出，農民的日常反抗不僅僅是行為方面，還包括思想和象徵方面，因此，我們不能忽略他們的意識，即他們賦予其行動的意義。事實上，他們創造的象徵、規範和意識形態形式構成了他們行為的不可或缺的背景。因此，斯科特不僅要揭示和描述日常反抗的模式，還要分析這些模式賴以產生的意義和價值的衝突。從此種意義上說，研究塞達卡村的階級關係，不僅需要研究行為，還需要研究意義和體驗：「我們既關注行動者的體驗，又關注行動本身；既關注人們頭腦中的歷史，又關注作為『事件流』的歷史；既關注對階級的理解和認知，又關注『客觀的階級關係』」(頁46)。

為了從經驗層面說明塞達卡的階級關係，斯科特詳細考察了聯合收割機的使用對窮人和富人的不同影響，以及他們關於某些「事實」的爭論。雙方都承認，使用聯合收割機之後，窮人受到了傷害，富人則從中獲益。然而，窮人受傷害的程度有多大，富人的獲益有多少，雙方存在爭議：富人總是試圖縮小他們的受益，而窮人則試圖誇大他們的損失。在談到聯合收割機時，富人更願意承認自己的獲益，而不願意承認窮人的損失；窮人則堅持認為，正是由於聯合收割機的使用，他們才失去了勞動機會，才變得愈來愈窮。富人基本上宣揚機器收割相對人工收割的一系列好處：它不僅提高了收割效率，還降低了收割成本；而窮人則試圖證明，除卻道德規範不論，聯合收割機的使用對

農民階級分散在廣闊的鄉村內，缺乏正式的組織，擅長游擊式的消耗戰。斯科特認為，從長遠來看，這類反抗最有意義、最有成效。農民的日常反抗不僅僅是行為方面，還包括思想和象徵方面，因此不能忽略他們的意識。

斯科特的研究目標是探究日常的意識形態反抗與日常的經濟反抗之間的關係；同時，他試圖表明，統治階級在何種程度上能夠把自己的意識形態（霸權）強加給從屬階級。

種田人來說並沒有甚麼好處，它破壞了田地的平整，帶來了收割次序上的麻煩。由此可見，窮人對聯合收割機的看法全然有別於富人，他們懂得用「相關事實」來支持他們的階級立場。

斯科特發現，在塞達卡，貧富之間的鬥爭不僅是關於工作、財產、糧食和金錢的鬥爭，也是關於佔有象徵符號的鬥爭，是有關如何理解過去和現在的鬥爭，是確認理由、評價過失的鬥爭。在談到村莊的歷史時，村民往往會詳細描述過去秩序中對自己有利的地方，並藉此來反對當前的制度安排：窮人之所以有懷舊之情，是因為過去的許多革新都妨礙了他們的物質利益；富人之所以不那麼具有懷舊之情，也恰恰是因為他們在現有的制度安排當中得到了更多的好處。斯科特進一步指出，在塞達卡，窮人與富人的口舌之戰——意識形態鬥爭——是「日常反抗」的核心部分，所以，他在關注反抗實踐本身的同時，也特別關注村莊內的意識形態鬥爭。

## 二 霸權理論的反思

在《弱者的武器》的最後一章，斯科特從「霸權與意識」的角度考察了「日常形式的意識形態鬥爭」，他希望將來自塞達卡的地方性見解與更大的關於階級的社會經驗，以及典型的階級鬥爭語境聯繫起來。斯科特在此明確指出，他的研究目標是探究日常的意識形態反抗與日常的經濟反抗之間的關係；同時，他試圖表明，統治階級在何種程度上

能夠把自己的意識形態（霸權）強加給從屬階級。

在簡單考察了馬克思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和葛蘭西的「霸權」（hegemony）概念之後，斯科特進一步指出，霸權、虛假意識、神秘化（mystification）以及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這樣的概念不僅無法幫助我們理解塞達卡的階級關係，還可能嚴重誤導我們對階級衝突的理解。原因主要有以下五點：

（1）洞察（penetration）問題。斯科特指出，霸權不過是葛蘭西賦予意識形態支配過程的一個名稱，其背後的核心觀念是，統治階級不僅要支配物質生產的方式，還要支配象徵生產（symbolic production）的方式。霸權概念沒有注意到，絕大多數從屬階級能夠在其日常經驗的基礎上，對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洞察和去神秘化。在社會結構與意識形態的關係問題上，斯科特極其贊同威利斯（Paul E. Willis）在《學做工》（*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1977）一書中對結構主義者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批評，「社會行動者並非意識形態的被動承載者，而是意識形態的主動使用者，他們只能通過鬥爭、爭論和部分地洞察那些結構來再生產現存的結構」（頁319）。塞達卡的田野研究表明，與葛蘭西的看法相反，從屬階級通常是在行為領域受到束縛，他們在意識形態領域有較大的主動權。

（2）必然性和正當性問題。霸權理論經常混淆必然性與正當性的區別，而從屬階級很少會犯這種錯誤。斯科特指出：

沒有理由假定，從屬階級會把必然性視為正當性，儘管故意順從的必要性通常會產生這樣的錯覺；沒有證據表明，支配模式如此完全地控制了從屬階級的社會生活，以至於他們無法營造自治的、反抗性的亞文化；最後，沒有理由假設，從屬階級完全受到了現存支配體系的包圍，以至於他們無法走上歷史的舞台。(頁335)

(3) 霸權內部的衝突問題。霸權理論和虛假意識形態理論的核心假設是，既然統治階級能夠說服從屬階級去接納現存的社會關係，那麼，其結果必然是意識形態的共識與和諧。然而，斯科特指出，一種霸權的意識形態 (hegemonic ideology) 必須表現為一種理想狀態，因而必然會引發一些矛盾；任何一種霸權的意識形態都在其內部為矛盾和衝突提供了原材料。從這種意義上說，我們既可以從現行的意識形態秩序的外部，又可以從它的內部去尋求群眾激進主義的根源。

(4) 工團意識與革命問題。在葛蘭西和許多馬克思主義學者看來，激進變革的首要障礙存在於思想層面，工團意識是革命的主要障礙。而斯科特指出，工團意識並不是革命的障礙，而是其唯一可行的基礎，因為大量的實踐表明，群眾運動即便是採用革命手段，它的目標也通常是有限的，而且多帶有改革色彩。

(5) 霸權的打破。葛蘭西認為，就從屬階級而言，其關鍵任務就是去創造一個最終能夠改變社會的對

立性霸權 (counter-hegemony)。而斯科特認為，從屬階級無法擔當這一重任，因為從屬階級通常是「向後看」的，他們傾向於維護自身對早期主流意識形態的解釋。「從歷史的角度說，一種主流意識形態的規範與價值體系的崩潰，通常是新的生產方式承載者 (例如資產階級) 的任務，而不是從屬階級 (如農民和工人) 的任務」(頁318)。

### 三 結 語

前面，我們簡明扼要地對《弱者的武器》進行了解讀，那麼，我們該如何評價「弱者的武器」？斯科特指出，如同先前對農民反抗的研究，如果將「弱者的武器」過度浪漫化，會導致很大的失誤，因為它們僅僅能對各種剝削農民的方式產生邊緣性的影響。另一方面，這些反抗也並非微不足道，它們限制了許多統治者的野心，縮減了國家的政策選擇範圍，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了更好地說明這個問題，斯科特形象地指出：

猶如無數的珊瑚蟲形成了雜亂無章的珊瑚礁，無數個體的不服從與逃避行為也形成了自身的政治或經濟堡壘……當國家的航船擱淺在礁石上時，人們通常僅僅關注船隻失事本身；他們沒有注意到，正是大量微不足道的行為才是造成失事的原因。(頁36)

在《弱者的武器》的結尾，斯科特對革命性變遷的前景表現出一種

我們該如何評價「弱者的武器」？斯科特指出，如果將「弱者的武器」過度浪漫化，會導致很大的失誤，因為它們僅僅能對各種剝削農民的方式產生邊緣性的影響。另一方面，這些反抗也並非微不足道，它們限制了許多統治者的野心，縮減了國家的政策選擇範圍，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悲觀主義，而這是農民或工人階級意識的核心內容。客觀地說，這種悲觀主義與其說是一種偏見，不如說是對絕大多數革命國家中工人和農民命運的現實評價。如果說一些國家在創建之前很少發生革命，那

麼，它們現在就更是銷聲匿迹了。有鑒於此，「即便我們不去讚美弱者的武器，也要尊重它」，「我們更有理由看到自我保存的韌性……恰恰是這種精神和實踐，防止了最壞的後果，預示着較好的結果」（頁350）。

## 悲情的鄉村

### ● 盧元偉

國家政權向鄉村滲透是二十世紀中國十分重要的現象。中國人意識到，要最終實現富國強兵夢，國家必須加強對社會的控制，整合全社會的力量。而向鄉村滲透政權，改變過去天高皇帝遠的鄉村自治狀態，則是實現這一夢想的必由之路。



張鳴：《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1903-1953)》(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

國家政權向鄉村滲透是二十世紀中國十分重要的現象，其緣起是1903年的清末新政，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所建立的一系列政治經濟制

度，則將其推向了頂峰。國家在這樣的過程中，成為了一個巨大的利維坦，無所不能，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對之進行制約，鄉村被緊緊地捆綁在國家前進的戰車上。鄒讜先生在《中國革命再闡釋》一書中，將這樣的一種過程稱之為「全能主義政治」。他認為，近代以來中國所面臨的內憂外患，使其處於一種全面的危機之中：舊的制度被打碎，新的體制尚待建立，整個國家處於支離破碎的狀態，任人宰割。由此，中國人意識到，要最終實現富國強兵夢，國家必須加強對社會的控制，整合全社會的力量。而向鄉村滲透政權，改變過去天高皇帝遠的鄉村自治狀態，則是實現這一夢想的必由之路。張鳴教授在《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1903-1953)》(下引此書只註頁碼)一書中向我們展示了這樣的一個過程。

首先，張鳴通過對一個村圖的論說，向我們展示了一幅傳統鄉村的風景畫。他認為，在傳統意義上，